

民國史研究叢書之六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下冊）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出版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下冊）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初版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全三冊）

定價：
精裝新臺幣 四二〇元
美金 一二〇元
平裝新臺幣 三六〇元

著作者：黃 季 陸 等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發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承印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下冊）

目次

論述：

四、革命之爆發及其影響

辛亥革命目擊記·····	梁敬錚·····	八八七
國父在辛亥革命時的外交決策·····	黃季陸·····	八九三
辛亥革命開國良知血誠的重現·····	秦孝儀·····	九〇七
從思想史角度看辛亥革命·····	余英時·····	九一一
由政治學眼光窺探辛亥革命的歷史背景·····	熊玠·····	九一九
辛亥革命之序幕——興中會之創立與首次廣州起義·····	李守孔·····	九二七
同盟會民報的言論與辛亥革命·····	蔣永敬·····	九五五
革命的馬前卒開國的雷霆聲——鄒容與「革命軍」·····	呂芳上·····	九六九
光復會與辛亥革命·····	張玉法·····	九九九
蔡元培的革命活動·····	鄧嗣禹·····	一〇三三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	李守孔·····	一〇五三

清季留日陸軍學生與辛亥革命·····	李守孔···一一〇五
臺灣志士與辛亥革命·····	陳三井···一一二五
蔣中正先生與辛亥革命·····	李雲漢···一一三七
黃興與武昌首義·····	李雲漢···一一六三
辛亥革命時期北方地區的革命活動·····	林能士···一一七五
清末新軍與辛亥革命·····	劉鳳翰···一二二三
辛亥革命與地方勢力·····	胡春惠···一三二九
辛亥革命與中國的軍事統治——雲南與貴州兩省案例·····	詹森···一三三九
辛亥革命時期的南北問題·····	張玉法···一三六三
英國對中國辛亥革命的態度·····	鄧勤臣···一四〇三
美國華僑與國民革命·····	陳裕清···一四一九
辛亥武昌起義後歐美黨人的活動·····	陳哲三···一四四三
辛亥革命對中國史學的影響·····	李又寧···一四六九
辛亥革命的社會意義·····	賴澤涵···一四七五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清帝退位之交涉·····	李守孔···一四八九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下冊）

論述

四、革命之爆發及其影響

辛亥革命目擊記

梁敬鐸

辛亥革命是孫中山先生前半生的工作中心，由此中心締造出一個中華民國，這一事業，何等偉大；今天海內外中國人既然都紀念中山先生，自必都會看重中山先生成就的事業，從而也必會珍視中華民國前途的發展。這是讀史論事的天然邏輯，用不着再加其他解釋。

但大家應該認定一個史實。辛亥革命是同盟會聯合當時國內其他政治革命團體共同奮鬥的事業，那時中國政治革命團體，有同盟會、華興會、光復會及科學補習所等；但那時不但沒有共產黨，就是國民黨也還沒有組織和命名。所以今天國共之間，關於辛亥革命是否小資產階級領導，抑是全民領導的辯論，在辛亥革命時代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或無中生有的問題，我希望能以目擊人的身份見證，來澄清這一段史事的真相。

辛亥革命並非「小資產階級領導」

本來「辛亥革命是小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批評係列寧發動的，但孫中山先生出身於貧農的家

庭，六歲上山打柴，十五歲纔有鞋子穿，他在檀香山發起興中會的時候，其創會成員，雖參有經濟充裕的華僑；而跟隨中山先生參加第一次廣州起義（一八九五）的同志，却都是華僑工人（見大陸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辛亥革命史稿頁五〇及六二），所以辛亥革命的緣起如說是出於貧農志士和華僑工人的領導，也不是沒有根據，安見得便是「小資產階級領導」，列寧之所云云？

辛亥革命的指導綱要，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真締，首見于一九〇四年孫先生修改的致公會章程，次見于中山先生一九〇五年遊歐發起同盟會組織的誓詞，最後則寫入于一九〇五年東京成立的同盟會盟約，盟約所載共十六字：

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

建立民國 平均地權

前頭兩句是民族主義，第三句是民權主義，第四句是民生主義。那時中山先生業已飽讀社會主義各種書籍，並深信節制資本、調劑貧富足為民主政治倫理之助力。其時馬克思資本論業已問世，第二國際正在組織，中山先生於經過比利時布魯塞爾百忙之餘，猶一訪社會黨國際局胡斯曼（一九〇五、五、十八），討論參加組織之事，可見中山先生在制定三民主義革命綱領之時，已對社會主義深有結契，不過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塞維克制度，認為不適用於中國而已。

列寧將全世界民族區分為三型，而將「一切不由共產階級專政的各殖民地革命」，概置於小資產階級領導之列，此等區別，並非定論。數十年來在歐亞非各洲各地各式革命中，且多證其非確。我們探討本國史事，儘可自辨性質、自究根源；似不必拾取他國名人之牙慧，轉限自己研討之基礎。

清政腐敗排滿復漢之聲四起

自與中會之組織，至同盟會之成立，其經過僅十年（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而清朝之統治力量，則大大減弱。戊戌變法之夭折（一八九八），己亥廢立之中止（一八九九），庚子事變之禍害（一九〇〇），在在皆呈現滿清政府之無能與腐化。由此表現，遂使與中會時代被稱作海洋大盜之孫汶，成爲同盟會時代救國救民共奉之領袖。中山先生自言，自乙巳年（一九〇五）起，伊已自知其排滿復漢建立民國之事業，將及身而可見。儘管壬寅癸卯（一九〇二——〇三）之後清政府也曾舉辦過各種新政，並極力泯除滿漢的界限。無如國力已失，民心已漓，一切掙扎圖存之設施都一變而爲仇滿反清之工具。例如鼓勵留學，則留學生競言革命；建立新軍，則新軍官兵多變爲革命黨；甚至奉旨促辦之資政院與各省諮議局，其原意本在配合政府，推行憲政，而成立之後，竟無一不與政府相敵對。凡此危機之四伏，怒潮之將爆，光宣之際（一九〇八——一九一〇）我在北京順天中學及上海南洋公學中院讀書時都能約略看到，更何待當時清室重臣如張之洞、陳寶琛等之所徬徨（張之洞病危時攝政王臨床問疾，張以國數將盡，宜清廉勵志爲本，語有所指）。

直接激起辛亥革命之事變有二，一爲各省諮議局代表要求縮短九年立憲期之失望，一爲鐵路幹線因有枝路仍准商辦政策之反抗。前者發動于一九〇九，經三次請願不許，且將東三省諮議局代表勒解回籍，於是湘鄂浙諮議局議長公言：「我等對於朝廷之籲請既已絕望，則只有與革命黨聯絡，才有出路」；後者發動於辛亥之四月，此政策本身雖無可議，而郵傳部當道對於已交之商股股款，不肯以現

金全部償還，反用高壓手段誘捕川省諮議局議長，與保路會會長副會長，商民請願無效，川督代求轉圜亦無效，反以查明首要准予就地正法相威凌，於是同盟會分會會員，哥老會潛伏首領，鼓煽罷市抗稅，榮縣且於是年七月獨立，武昌起義，川路爭執尚在紛紜，榮縣獨立亦未解決，故論川事者遂有「若論革命首義有功，則此榮譽應歸諸四川之榮縣，不應屬諸湖北之武昌」之說法，揆諸史實並非無由。

中山先生讓位擊破日本陰謀

武昌起義不及兩個月，而響應者達十省廿八處（郭廷以先生遺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參考），未及八十三日而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國祚，即告顛覆。由此一端即可窺見其時晚清政府已成肉腥魚爛、土崩瓦解之局。但當時排滿之聲勢雖雄，而滿籍文武官吏與帝子王孫之戕害則爲數絕少。史冊所載，疆吏以失城殉難者只三四人而已，以視宋元明易代之際所遭之殺戮，固不能相比，若持與法俄革命時皇族所受之慘禍，尤不相侔，此蓋半出於中國禪讓政治之做法，殊非外論之所能了解。

辛亥革命之所以倏起倏落者，殆因同盟會革命最初只以排除滿清政權爲主要目的之故。惟其如此，「漢人袁世凱如能推翻清室便可酬以總統」之密議遂生。此密議先由黃興電託汪精衛（時在北京與袁氏父子有往來）轉告袁世凱，當十月初旬（陰曆）北軍攻佔漢陽後，馮國璋本有乘勝恢復武昌之計劃，因袁世凱以電話阻止而罷。自是之後，南北表面公然議和，而袁黃間磋商酬庸之密使則往來於武漢寧滬之間。北方密使廖宇春與黃興代表顧忠琛卒於十月下旬在上海某書局樓上簽定「先推倒清室者爲

總統」之密約，今此密約業已公開於世史。此密約雖非 中山先生之造意，但亦確得 中山先生之贊成，十一月六日（陰曆） 中山先生自港抵滬十日當選爲總統之後，立即電告袁氏，聲明此係暫維政局，仍當懸位以待，其內容之實際蓋如此。

中山先生敝屣尊榮讓位袁氏之政治舉措，目袁氏嗣後洪憲帝制行徑言之，誠爲失著。但當時此舉，擊破日本支援清廷割裂中國之陰謀則實，亦有其成效可資探討。嚮使當時袁黃之間無如此之安排，則南北和議，將必決裂，決裂之後，中國南北將有長期之內訌，受其利者將爲日本與帝俄，中華民國縱能產生，亦恐難以統一面目與世史相見。此爲 中山先生無形之貢獻，亦願治史者一省察之。

國父在辛亥革命時的外交決策

黃季陸

(一)

中山先生曾說：「革命的成功，一是靠武力；一是靠外交。」他在「中國存亡問題」一書中又說：「凡國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他之重視外交，實爲其遠大的政治作風重點之一，這亦就是他所倡的革命事業，與康有爲、梁啓超的改良主義大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所領導的革命事業，雖屢經失敗而能卒抵於成的一個重大的因素。

研究近代外交史的人，有兩件奇特的事實，至今思之將會使人不予置信，其一是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前，在我們的政府中，還沒有基於平等互惠敦睦邦交的專司外交政務的組織，有之則爲舊有的「理藩院」，而理藩院所職掌的則是處理藩屬附庸的事務，有類於近代各國殖民部的組織，這自與近代國家外交部的組織大異其趣。其二是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尚沒有基於平等原則派遣敦睦友善的外交使節赴各國訪問，有之則在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但是中國派赴各國訪問的第一位使節並不是中國人，而是一位卸職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先生（Anson Burlingame）。造成這些事實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在此以前，我們認爲除了中國以外，天下並無其他平等文明的國家，認爲捨中國以外不是藩邦附屬，便是文化落後的蠻夷之邦。我們因襲了舊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

觀念，閉關自守，妄自尊大，視外國爲藩屬、爲附庸，視外國使臣爲貢臣，毫無近代平等互惠的邦國觀念。因此政府的組織，便無近代各國專司外交的機關，更無派往外國辦理外交的使臣。鴉片戰爭結束，中國門戶洞開以後，外人往來中國日趨頻繁，滿清政府受戰敗條約的威迫，出於一種迫不得已的心理，才不得不逐漸改變態度，有與各國發生正常的外交關係之必要。及至咸豐七年（一八五七），英法聯軍之役，中英天津條約訂立，由於條約的約束，中國與西洋才奠立了近代外交關係的基礎。自此以後，各國乃有常駐北京的使節。由於事實的需要，亦才有咸豐十年（一八六〇），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改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置。但其職掌尙兼管海軍、海關、鐵道、鑛產等事務，直至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辛丑條約之後乃成立外務部，爲在政府中正式成立專司外交的機構之始。

蒲安臣先生當年以一洋人身着滿清大臣的服裝，率領志剛、孫家穀等人先後訪美、英、德、法、俄諸國，在外交禮儀上曾鬧了不少的趣聞，但於各國邦交的促進確大有裨益。這次訪問歷時不久，蒲安臣先生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二月不幸在俄國聖彼得堡病死了。志剛、孫家穀等經意大利、比利時返國，我國第一次出使遂告結束。一直到了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乃有第一位中國使臣郭嵩燾先生的出使英國。他的確是一位有見識有抱負的人物，就他在國外體認觀察所得，對國是竭盡忠言，結果他所招來的却是國內士大夫的謾罵，說他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如像湖南的大學者王闓運就有一聯語譏刺他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當時士大夫對外交使節的派出大不以爲然，認爲「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類質子，供其驅策，隨其顰笑，徒重辱國而已。」可見那時大多數人對近代的外交仍無所認識。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當日，國父正由美國的舊金山前往美國的東部，適於此日之次夕到達丹佛城。在他的自傳中曾有下列的記載：「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典華城（即丹佛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碼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香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饑，先至飯店用膳，道經迴廊報販，便購一報携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看見電報一段云：『武昌爲革命黨佔領』。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爲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覆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踪，遂起程赴美東，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

照常理於得悉革命軍佔領武昌之後，中山先生本可停止東行，折回舊金山，由太平洋返國，爲何當革命黨人在國內拋頭顱洒熱血之際，而他却仍在國外稽延時日呢？其所以捨立即返國而不爲者，實因其衡量全局，擇其最急而有更大貢獻於革命者而爲決定，個人利害毫未計及。國父當日第一個決定爲：革命軍既已佔領武昌，革命的成敗，已不單在於決勝疆場之上，而是在折衷國際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爲更大。所以他先從外交入手，俟此問題解決，然後返國。

國父爲甚麼要有這一決定呢？而此一決定在當時爲甚麼是十分重要呢？我們要明白此點的重要，必須先了解當時中國的處境。辛亥年正是庚子義和團事件之後十一年，庚子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中國能倖免於瓜分已屬萬幸。自此之後，民族的自信心已漸趨喪失，每遇外交問題發生，無不談虎色變。因此，在革命初起的時候，最應顧慮者厥爲外交問題：誤解革命爲另一義和團事件，造成國內外對革命之恐怖，其可慮者一；召致列強之干涉，其可慮者二；迫使列強陰助滿清以對付革命，其可慮者三。凡此種種，在當時不僅有發生的可能，且在後來發現的若干事實，皆足以證明此種顧慮之必要。舉例言之，當革命軍佔領武昌之後，兩湖總督瑞澂，本擬逃往漢口租界，求援於各國領事，指革命軍爲義和團。當時俄德兩國駐漢口領事，一聞拳匪之亂再作，竟有援助瑞澂以對付革命軍的主張。幸而當時駐漢口的法國領事羅氏，爲國父的舊友，正任領事團首席領事，當各國領事召集會議商議共同行動時，羅氏力持正義云：「革命軍乃奉孫逸仙博士之命行動，孫氏所領導之革命，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拳匪可比。」於是各國乃宣告中立。瑞澂因不得外力之援助，遂逃往上海，革命軍遂得確實佔領武漢。此一事例雖然不是當日國父在丹佛途中事先所策劃，却是由此可知當日發動革命，在外交上之顧慮不能不以審慎之態度出之了。

武昌於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首義，二十日克復漢陽，二十一日克復漢口。三鎮底定之日，革命軍迅即以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北督署名義，照會各國領事，承認各國在華利益，以安定各國之態度。照會中有下列之宣示：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一賠償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一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一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一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一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一各國如有救濟清政府以可爲戰爭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

以上七條亦旨在通告各友邦，革命軍師以義動，絕不能與義和團並論。當時革命軍政府之不得不因應列強勢力，亦於此七條文字中見其端倪。

國父當日第二個決定是：他認爲在中國利益最大的有英、日、美、法、德、俄六個國家。在他分析這六個國家的利害關係所得的結論是，美、法兩國政府與人民對革命均有好感，不致妨害我們的革命；德、俄兩國當日之趨勢，當趨向於滿清政府；英國則因日、英同盟關係，其民間同情革命，而政府之方針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日本與中國關係最密，日本軍閥對中國侵略之野心尤爲可怕，其民間志士雖多同情中國革命，且有爲革命而犧牲者，但是日本政府之方針，則爲反對革命者。欲轉移對我革命有切身成敗關係之日本政府對華方針，英國的爭取，便十分的重要。若英國同情革命，則日本也不足慮了。於是國父便決定了暫不返國，直赴紐約乘船赴英，以英國爲其第一目標，作其外交活動。

關於日本政府與民間志士對於辛亥革命之態度，據日人古島一雄事後的追述，當武昌起義之後，

素來同情中國革命的大養毅先生，便急切準備來華，當其動程以前，曾往訪日本外相內田康哉，探詢日本政府對華方針。大養謂：「政府何以不欲中國實行共和政治？」內田的答覆是：「中國實行共和政體，日本勢將感覺萬分困難，故表反對。在日本立場，即令施用武力，亦將維持中國之君主政體，此項方針，希轉告華南革命領袖。」日本政府當時竟有不惜施用武力以干涉中國革命的主張，其理由究屬何在？可以從另一事例予以說明。古島一雄當時亦是隨大養毅來華贊助革命之一人，在其動程之前，有一日本要人名叫都築馨六者告之：「目下世界已有美國爲共和國，如再聽任中國亦爲共和國，則被夾制在中間之日本帝國，其前途究將如何？希君等善爲考慮。」原來日本政府當日此一對華方針，其內幕原因，一在蓄意侵略中國，一在深恐中國共和政體建立以後，與共和政體之美國遙相呼應，將於日本不利。由於日本政府此一思想之根深蒂固，卒至造成後來之侵華戰爭與珍珠港事件，弄到日本國家幾乎至於覆滅。

(三)

國父當日英國之行，在外交上所獲之成就，對於後來日本對華方針之改變究發生多大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可是有一事實足以說明的，則是日本在辛亥時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之舉並未實現，而後來內田外相因迫於民間輿論之攻擊，與英國之對華政策舉棋未定，不得不在日本議會聲明其並無以武力強迫中國維持帝制之企圖，則反而成了事實。

國父在英國的另一重要奮鬥，關係辛亥革命成功的效果更大。即是當時滿清政府與英國爲首的四